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 三邊互動

5月的最後一天，編者結束了十天的台灣之行，深受「三二〇」總統大選後台灣社會撕裂狀況的衝擊。另一方面，鑒於對立日益嚴重，台北以及來自北京、上海的學者多次向我們表示，如何真實地了解對方（包括海峽兩岸及本地不同的思想派別），促進對話，深化思想，《二十一世紀》扮演着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我們期待各地學者主動關心、支持本刊，特別是積極參與公共話題的策劃和討論，真正把本刊作為自己的言論空間。

——編者

### 令人着迷、令人困惑的「主義」

4月號許紀霖在紀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的長文中，提出對李慎之等歷史人物如何定性、如何評價，始終繞不開各種「主義」問題。他說「自由主義是否有道統，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我想，馬克思主義也存在類似的問題。那些曾經在人類歷史上產生過廣泛影響的「思想」或「主義」，都包含着一些人類共有的理想價值訴求——如真善美、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不例外。然而遺憾的是，當他們的思想由觀念形態向現實制度形態轉變的過程中，特別是當它們從西方語境移植到東方社會的時候，有些不可或缺的價值觀念預設被有意或無意地屏蔽了，結果僅僅剩下若干細碎化了的簡單信條和政治策略。在我看來，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強調其意識形態的屬性，借助學術思想以外的力量建立某種「話語霸權」，認識稍有歧義便冠以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罪名，實際上是出於某種現實政治的需要。那種做法的本質是不要思想，而不在乎你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還是「自由主義」。

李慎之等早年投身革命，源於對「主義」的真誠信仰，而其晚年對「革命烏托邦」的唾棄，並不意味着對早年理想的背叛，而是出於對中國革命實踐的反思。80年代關於「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有助於在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判斷與工具理性之間——也即在革命的終極目的與革命的手段方式之間——建立起一種積極健康的制衡關係，從而使革命實踐更加人性化。

我認為只有真正從人類的終極關懷出發，才能理解「理

想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確切含義，才能理解為甚麼李慎之們會集「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於一身。

董國強 南京  
2004.5.10

### 五四運動和量化研究

我們現在研究五四，其實是在研究五四的解釋史。至於真實的五四，往往被遮蔽了。金觀濤、劉青峰的〈五四新青年群體為何放棄「自由主義」？〉一文（2004年4月號），對原始文獻進行細緻的數據統計與分析，澄清後來因思潮轉變所造成的對歷史的種種誤解。比如說，文章提出「巴黎和會的意義，是在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不斷被加強、深化的」，以及「對十月革命的注重發生在1919年以後甚至是20年代初，也就是五四運動以後」這樣的結論。雖然以前也有學者憑藉直覺提出過類似的觀點，但相比之下，金、劉一文建立在數據分析基礎上的結論就有力得多。其他，如對「張勳復辟」與「新村運動」對觀念轉變之影響的重視，也是該文的一大亮點。

不過，最值得討論的也許是作者在文章最後對新青年群體是否信仰真正的自由主義提出懷疑，他們反問「如果我們把新文化運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本文一開始提出的『五四新青年群體為何放棄自由主義』這個問題本身是否有意義也就很值得懷疑了。……新文

化運動倡導的啟蒙價值的本質又是甚麼呢？」這個問題具有顛覆性，既涉及到對自由主義的理解，又涉及到對五四前中國思想界的總體認識。另外，全文一個主要立論是，在二十世紀頭十年中廣泛存在過把私領域道德和公共領域道德視為互不相干的二元論觀點。這也是令人懷疑的。

王志泉 南充市  
2004.4.28

## 告別歷史？

4月號〈告別九十年代〉一文的作者在某種意義上宣告了一個歷史時段的終結。但回頭看90年代，是否存在一個「未曾言明、但卻心照不宣的〔終極〕目標」，以至知識人「表現出強烈的過渡心態」，「希望利用有限改革的空間鋪陳出一套過渡性的程序和制度」，以最終抵達所欲目標，這是一個問題。「業已建立起來的程序性制度能否妥當安頓可能出現的社會衝突」，包括妥當安頓對不同終極目標的信仰者之間的衝突，這是另一個問題。

作者進一步問道：90年代政治意識最大的困難就在於「在權利衝突的地方，國家能否堅持正義？在不同的『權利』要求之前，國家權力如何確立自己的正當性？」這是一個霍布斯時代流傳至今的老問題。

末了，自然意義上的代際更迭是否意味着歷史意義上的直線進步，是否意味着後來者無須擔負歷史「創痛記憶」，這

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本體論問題。用洛維特的話說：「能夠從根本上產生歷史解釋的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對歷史行動所帶來的災難和不幸的體驗。」也許我們有望告別「全贏全輸」式的革命，但卻無法告別歷史行動中的惡和苦難。

楊國成 上海  
2004.5.2

## 思維與秩序

李建會在〈現代科學中的非中心化思維〉(2004年4月號)一文中，把人類思維方式劃分為中心化與非中心化兩種。作者在文中着意的是秩序如何構建的問題，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但作者在論證中存在一些不足。在論證中心化思維時，作者從日常生活入手，繼而轉入科學史中尋找相關例子，這是一種先給出結論再尋求證據支持的研究方法。在論證非中心化思維時，作者把計算機仿真實驗視作一場現代科學的新革命，並將實驗中的某些研究成果歸納為非中心化思維。但仿真實驗畢竟只是一種模擬實驗，與真實世界仍有極大距離，在運用其實驗結果時必須謹慎。因此，以仿真實驗結果特別是三個同質性非常高的例子(鳥群的群集行為、白蟻清理蟻巢的行為、螞蟻覓食行為)來試圖歸納非中心化思維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懷疑的。

瑕不掩瑜，該文引出了思維與秩序的重大問題。我們可以把這兩種思維方式的思路運用於檢視政治社會領域。社會秩序到底是被某一居於中心的領導者或領導集團所設計出來

的？還是由不同個體各自行動而不自覺形成的？這不僅是關涉思維方式的問題，同時也是事關政治選擇的重大問題。

林劍泉 廣州  
2004.5.4

## 藝術與政治，二十世紀的問題？

高天民在〈二十世紀的藝術與政治〉一文中(2004年4月號)，把藝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看作二十世紀藝術特有的現象。比格爾在〈先鋒派理論〉中將西方藝術的發展概括為三個階段：宗教藝術、宮廷藝術和資產階級藝術。他提出二十世紀以來的先鋒派運動，是對十九世紀藝術自律的批判和否定，「試圖在藝術的基礎上組織一種生活實踐」。這樣看來，高文把握是準確的但並不全面。因為，藝術作為社會事實，不管它是否願意，都要與特定的社會因素(包括政治)發生關係，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大影響的社會因素。現代主義藝術運動標誌着藝術自我意識的無限擴張，它主動積極地批判社會，要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對社會進行改造。而一旦某一力量無限強大控制全社會時，藝術不可避免會淪為這種力量的依附。30年代的法西斯專制、斯大林專制和中國毛時代的政治藝術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但是，高文把政治主要理解為專制統治，這種政治統治把藝術當作宣傳工具，是否失之於簡單化？是否專制政治消失了，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就變得更加隱蔽和複雜了呢？

楊道聖 北京  
2004.4.28